

· 内部刊物 ·

# 西北历史资料

1980 1

---

## 编 者 的 话

《西北历史资料》是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印的一种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每年二至四期。

西北历史研究室的研究方向是中俄关系史、西北民族史和西北历史地理。

研究室成立伊始，水平低、人手少、资料缺、条件差，殷切期望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因将我们翻译、编写的部分资料、文稿陆续在《西北历史资料》上刊出，欢迎批评指正。

# 目 录

|                                   |                    |
|-----------------------------------|--------------------|
| 轻易牺牲历史科学的一个实例·····                | 李之勤 (1)            |
| 承化寺——抗俄斗争的英雄城堡·····               | 王宗维 (7)            |
| 关于云冈石窟的“柔然题铭”·····                | 周伟州 (18)           |
| 所谓复制宋本西夏地图问题·····                 | 求 实 (25)           |
| 汉文西夏唐古特国地图册手稿·····                | (苏)克恰诺夫著 李步月译 (30) |
|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和俄国<br>与准噶尔汗国的相互关系····· | (苏)古列维奇等著 桥西译 (40) |
| 十八——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中贸易·····             | (苏)加利佩林著 姬增禄译 (56) |
| 咸阳始建国律量龠尺·····                    | 胡 戟 (74)           |
| 汉唐长安城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             | 李健超 (78)           |
| 清代前期陕西植棉业的发展·····                 | 志 勤 (87)           |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三月

# 轻易牺牲历史科学的一个实例

——评古列维奇《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历史的若干问题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刊物对这些问题的歪曲》一文对古代  
文献的态度

李 之 勤

近年来，在苏联历史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俄关系史的文章中，采取歪曲史料、伪造历史的劣卑手段，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谬论辩解的倾向，越来越露骨。在这方面，古列维奇的表现相当突出。他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历史的若干问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刊物对这些问题的歪曲》（载《苏联历史》杂志，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一九二至二一〇页）一文中，一方面诬蔑我国历史学者对沙俄侵华暴行的揭露是“没有根据的”，是“轻易地牺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同时又肆无忌惮地曲解文献，篡改历史，并用凭空捏造，强加于古人；捕风捉影，以假当真的卑劣手法，丑化中国的历史形象，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

恶意歪曲中国古代文献，公然篡改历史的例子，是古列维奇对中国汉代的“荡姐”和“两越”的解释。古列维奇的文章中说：“著名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班固在阐述汉代中国对邻近各民族的政策时写道：往时尝……籍荡姐之场，……拔两越之旗”。对此，列维奇专门加了注释，说什么“荡姐”就是“康居”，而“两越”则是“越南”。并进而评论中国汉朝对中亚和越南的关系，影射、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霸权主义计划”，“力图继承古代汉族统治者的遗产”，对苏联和越南抱有领土野心。但是，这种曲解史料，伪造历史，又进而借“古”讽今的卑劣手法，只能暴露自己，是骗不了任何人的！

核对一下历史文献就可以知道，“荡姐”不是“康居”，“两越”不是“越南”，

古列维奇引用的上述两句话，也并非首先出于“著名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班固”之口，而是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引用汉代著名文学家杨雄给汉朝皇帝上书中的。杨雄这封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则是要求汉朝最高统治者应当继续维护与加强同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和亲政策，并不是赞美汉朝统治者对邻近各民族发动军事进攻的。

古列维奇懂得汉语，读过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名著《史记》、《汉书》。通行本《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的颜师古注就曾引刘德的话说：“荡姐，羌属”。也就是说，荡姐是我国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元朝著名历史学家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推测荡姐就是“陇西羌乡姐”，说明它的活动地区就在今甘肃、青海交界一带。而汉代的康居呢？它是活动在今苏联境内哈萨克斯坦南部，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的一个游牧国家，与陇西相距数千里。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后半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康居就与汉朝建立了友好联系。其后并派使臣入贡，遣侍子入朝。它虽与汉朝西域都护所辖的西域城郭诸国有所区别，但仍是汉朝的属国。与乌孙一样，也在西域都护的督察范围之内。西汉与康居间发生的唯一的一次武装冲突，是公元前三十六年（汉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付校尉陈汤讨灭北匈奴郅支单于之战。郅支单于是与呼韩邪单于等五单于争位的匈奴单于之一，原曾与呼韩邪单于一样向汉朝称臣纳贡，且遣侍子。后来“怨汉拥呼韩邪单于而不助已”，遂拘辱甚至杀害汉朝使臣，西奔康居。并于康居游牧地区的都赖水畔修建了都城，不断侵扰乌孙、大宛、閼苏等国。甚至连康居也不免遭受他的侵袭。史称“郅支单于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康居人民和贵族“皆怨单于”。建昭三年，汉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付校尉陈汤矫诏发汉在西域戍卫和屯田的士卒，以及城郭各国之兵奔袭郅支单于。进入康居境内以后，汉军注意争取和团结康居贵族，严肃军纪。“令军士不得为寇”，得到康居人民和一些贵族的支持与协助，顺利攻下郅支城，杀郅支单于而还。康居遂再“遣侍子，贡献”如初。所以这次汉军进入康居，实际上的作战对象是北匈奴郅支单于，主要是汉朝与北匈奴间的战争。中国古代籍、藉二字有时通用。籍的意思是文书簿籍，征收税赋。藉的意思是践踏、蹈履。如果象古列维奇所说那样，荡姐就是康居。那么，汉朝的军队确实到达过康居的牧地，但却没有统计康居的人民、牧场、牛、羊，向康居人民征收赋税。在“籍荡姐之场”这句话以后，杨雄的奏疏中还有“郡县而置之”一句话，说明汉朝统治者曾在荡姐所居住的地区设置了郡县，委派了文武官员进

行统治。但汉朝军队进入康居，攻杀郅支单于之后，并没有强占康居的国土，留兵设防；也没有改变康居的政治制度，在康居分设郡县。尤其是杨雄在奏疏的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话，“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岁费以亿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造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如果荡姐就是康居。那么杨雄为什么不把这个康居也称为荡姐，却要在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国家使用两个不同的名称，而又不作任何说明呢？可见荡姐并不是康居，也不在西域。

“两越”不指越南，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常识。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个《南越列传》（第一一三卷），又有一个《东越列传》（第一一四卷），这两卷的内容是叙述西汉初年中国南方两个割据政权的历史的。班固《汉书》有个《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九十五卷），其中的“两粤”部分，与《史记》上述记载相同。中国古代越、粤两字相通，所以“两粤”就是“两越”，“南越”即是“南粤”，“东越”就是“东粤”。称为南越，是因为这个割据政权在中国的南部；称为东越，是因为这个割据政权在南越的东面。东越的统治者是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其统治地区主要是今福建省，都城在东冶，就是现在的福州市。由于福建有条大江叫闽江，秦朝曾经在这里设置一个闽中郡，所以东越也称为闽越或闽粤。南越的头一个统治者是汉族人赵佗，他的老家在今河北省的正定县。秦朝时期赵佗曾经担任南海郡龙川县（今广东省龙川县）的县令。秦朝灭亡，中原混乱，他就在岭南据地称王。南越统治的地区主要是今广东、广西两省，也包括了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北部和中部沿海地方。南越的都城在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相吕嘉谋反，杀南越王和太后。汉朝派军队从今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分道前往征讨。从贵州、广西进军的汉朝军队还没赶到，从江西、湖南出发的汉军已经攻下番禺，擒杀吕嘉，灭亡了南越。番禺以外的南越郡县，也都不战而降，战争并没有蔓延到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明年，汉朝又灭亡了东越，统一了南方。所谓“拔两越之旗”就是指汉朝灭亡南越和闽越，统一南方之事。所以，所谓两越，就是指南越和东越这两个汉代前期中国南方的割据政权，这是确凿无疑的。汉朝在灭亡两越之后，把原来东越统治的地区，划归会稽郡统辖，而把原来南越统治的地区，分别设立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其中在现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二十三县。但这些地方，本来是当时中国割据政权南越辖境的一部分，汉朝平定南越之后，又作为汉

朝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然也没有独树一帜的旗帜可拔。怎能把“拔两越之旗”的事情，加在当时并不存在的越南的头上呢？

凭空捏造，强加于古人的例子，如古列维奇在文章中声称，“根据《清史稿》这些文献记载，清朝征服者甚至打算通过费尔干河谷地直达塔什干汗国”。但《清史稿》卷五二九《属国传》的原文却只是说，乾隆二十三年（公元一七五八年），清朝参赞大臣富德为追捕叛匪阿睦尔撒纳和哈萨克锡喇，接近了右部哈萨克和塔什干地区，遣蒙固尔岱、赫善“往抚”。这时，作为塔什干三和卓之一的吐尔占正和右部哈萨克首领吐里拜“战于河上”。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清朝的军队并没有趁塔什干与哈萨克间发生战争之机，向他们发动进攻。而是“谕以睦邻守土之义”，调解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使之“皆感悟释兵”，重归于好。此后右部哈萨克和塔什干的首领就先后派遣使臣，到北京向清朝皇帝称臣纳贡，请为属国。历史事实和文献记载都说明，古列维奇所说的“清朝征服者甚至打算通过费尔干河谷地直达塔什干各汗国”的事，纯属捏造，连一点影子都没有。而且，当时富德追击哈萨克锡喇的路线，是从伊塞克湖向西，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由此折向西南，不远就是塔什干。而费尔干河谷地，却在塔拉斯的正南偏东，其距离比从塔拉斯到塔什干还远，又隔着高耸险峻的塔拉斯山脉。假使富德真的要进军塔什干，也不会舍近路、坦途不走，反而掉头转往东南，绕远路，经险途，取道费尔干河谷地前往塔什干的道理。古列维奇又说：“按照上一世纪中国历史学家魏源的说法，这次对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征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损失。”但是，魏源在《圣武纪》卷四中，包括对进入哈萨克追击阿睦尔撒纳在内的整个准格尔之战所作的叙述，都是着重介绍清朝的进军如何顺利，说明平定准格尔部，统一新疆的意义如何重大。并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论证了新疆平定之后，清朝并没因为加强防务而“增兵”、“费财”。还列举具体资料，说明“不仅未尝糜饷，而且节帑”。根本没有谈到清军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遭受了怎样巨大的损失这类内容。

捕风捉影，以假当真，集中表现在古列维奇对沙皇俄国时期形成的档案资料的应用上。例如，古列维奇根据沙俄档案中记录的“从土尔克斯坦回来的俄国人”提供的消息，诬蔑中国清朝政府的军队准备“向大布哈拉进军”；根据哈萨克某个头人的报告，诬蔑清朝皇帝“甚至企图到达大布哈拉和希瓦国境外”；还根据沙俄商人在哈萨克汗阿布齐游牧地区从浩罕商人那里听到的消息而向沙俄奥伦堡总督府提供的情报，说“一九五

九年夏，中亚人民同满州中国军队发生了相当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它以征服者的失败而告终。”“有吉尔吉斯人支持的乌兹别克人民的反抗，破坏了清军的指挥计划”。“乌兹别克人会同吉尔吉斯人或所谓的布鲁特人消灭了七千中国军队。”试想，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意图、战略决策、军事部署，都是国家高度机密，连一般官员事先都不得而知，这些远离现场而又与清朝统治者并无联系的外国一般商人，又何由得知？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判断，由这些商人的道听途说而形成的档案资料，在说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时能有多少价值！实际上，上述种种，都纯属于虚、乌有之事。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清朝军队远征布哈拉和希瓦之事。清朝军队也没有与乌兹别克人、布鲁特人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而，不论中国清朝的、沙皇俄国的，以至中亚各国的历史资料中，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既然如此，为了诬蔑清朝、攻击中国的需要，古列维奇只有乞灵于商人的道听途说来胡说八道了。

除上述各点外，古列维奇《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历史的若干问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刊物对这些问题的歪曲》一文在资料使用上的错误还有很多。据核对，该文共引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十四种二十五次，其中光是关于被引各书作者、卷数、页数方面的错误，就有七种十二次之多，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如，该文曾引用所谓一九二七年沈阳出版的《清史稿》第五三四卷的材料，说明“一七六三年，巴达克山的统治者对清朝皇帝的贡品就是几条狗和鸟等等”。但一九二七年沈阳并没有出版过《清史稿》，被称为“关外本”的《清史稿》实际上也是在北京而不是在沈阳印刷的。这种版本的《清史稿》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第五百三十四卷是清朝的《属国传》二《安南》部分，卷中并无古列维奇的引用的资料。一九二七年以后，沈阳也曾重印过《清史稿》。但这种《清史稿》只有五百二十九卷，并没有个第五百三十四卷。在其第五百二十九卷所附的《巴达克山传》中，倒是有古列维奇所引的上述资料。可是资料明明说巴达克山对清朝的贡品是“犬、马、鸟枪、腰刀”，并没有说什么贡“鸟”。古列维奇上述文章还引用了“中国地理学家王锡祺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的第二卷、第一一六张背面上”“描写中亚各地情况”的资料。但从《丛钞》这个书名就可断定，王锡祺只是《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书的汇编者，而不是主要撰写者。这部书又是分帙而不分卷的。翻开此书的第二帙第一一六张背面，赫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空白。因为它完全是一个空页，

并无任何内容。当然不会也不可有古列维奇所引用的资料了。

上述这种种情况，雄辩地向人们显示，苏联的历史学界现在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了。他们为了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世界，侵略扩张政策服务，不仅反华、仇华，丑化中国的形象，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诬蔑中国要侵略苏联、侵略越南、侵略邻国，还公然歪曲、篡改、伪造中国的历史。他们用任意曲解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伪造历史的手段，胡说荡姐就是康居，两越就是越南，诬蔑中国在汉代就对越南和中亚进行征服侵略。他们把自己凭空捏造的谎言，编造的谬论，强加在中国古人的头上。当作中国人作的事，说的话，来欺骗世人。他们还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地搜罗一些谁都不会相信，也根本不可能成其为事实的道听途说的传闻，胡吹乱造的情报，冒充史实，混淆视听。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要尊重历史。古列维奇之流的所作所为，距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态度，相去何啻十万八千里！把古列维奇诬蔑中国历史学者的帽子戴到他自己的头上，不是更为恰当吗？从对历史文献的态度看，古列维奇的《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历史的若干问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问题的歪曲》一文，就是轻易地牺牲苏联历史科学的一个活标本。

# 承化寺——阿勒泰

## 我国西北边疆抗俄斗争的英雄城堡

王宗维

鸦片战争前，中国西北边疆同沙俄交界的地方在额尔齐斯河岸的铿克尔图拉（乌什奇·卡纳诺果尔斯克），为了防御沙俄侵略，清朝政府在此东南一带，设有许多卡伦。《理藩院则例》中还明确规定：俄罗斯除在恰克图交易外，霍尼迈拉呼不准通商。

1840年以后，沙俄不断向中国西北边疆进行侵略扩张，蚕食中国领土。1864年，沙俄通过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的大片领土，从此，中国西北边疆的斋桑湖及其周围的许多屏障要塞相继沦丧，阿尔泰地区唇亡齿寒，处于边防前线。

### 承化寺的兴建

阿尔泰地区原属清朝政府乌里雅苏台将军所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是我国蒙古族牧民游牧的地方，自元代以后，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都曾在这里游牧，后来一部分乌梁海蒙古也到过这里。1866年4月11日（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塔城各族起义人民占领塔城，守城参赞大臣武隆阿被杀。当时伊犁将军派往塔城的增援部队——棍噶扎勒参喇嘛和图库尔领队大臣所率的厄鲁特土尔扈特蒙古部队，没有赶到塔城，在中途收集逃散的蒙、汉、满等各族群众男女数万口，离开塔城地区，取道霍博克赛里，向东迁移，欲往甘肃军营请求清朝政府保护。行至青格里河地方，同新赴任的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署理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相遇。李云麟劝阻棍噶扎勒参等停止东移，遂转向乌陵古河一带。后来，李云麟奏请清朝政府：将棍噶扎勒参所率厄鲁特、土尔扈特牧民，“全数赐给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作为门徒，安置其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一带。”次年八月，清朝政府准其所请，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安置流离失所之蒙民，

并希望“可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屏障”。清朝政府还指出“此节关系甚重，不可不妥慎筹画”，并指令李云麟等要“认真办理”，“毋得敷衍了事”<sup>①</sup>。十一月，奏准设立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管理该部蒙民事宜，李云麟兼署办事大臣职务，筹办择地建府事宜。

棍噶扎勒参所部牧民迁移到哈喇额尔齐斯河地区后，除清朝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指划牧场，进行安置外，当地我国各族牧民大力协助，热情支援。哈萨克族库库岱之子阿吉公所部牧民，立即捐助马一千匹，羊二万只，帮助棍噶扎勒参部移民安排生活；土尔扈特部的王公扎萨克等，也积极捐助羊、马、口粮等物；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各族牧民还搬迁牧场，为新迁来的蒙族牧民提供牧地。

棍噶扎勒参被安置在新的牧地后，积极协助清朝官员安定社会秩序，并得到清朝政府的表彰。1869年清朝政府根据棍噶扎勒参的请求批准在阿尔泰山修建庙宇。1870年夏，棍噶扎勒参等在哈喇额尔齐斯河北支流奇兰河岸选择地址，开工修建。次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派人前往勘分牧场界址，规定：“东以罕达噶图河为界，西以哈巴河为界，南以额尔齐斯河为界，北以阿尔泰山大岭为界，周回约计七百余里”<sup>②</sup>，作为棍噶扎勒参所部僧俗人民驻牧之地。寺庙建成后，赐名“承化寺”。从此，以“承化寺”为中心，在阿尔泰、哈喇额尔齐河流域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边疆城镇。

## 承化寺在斗争中发展

承化寺所在的奇兰河流域，是一块美丽富饶的牧场，群山碧绿，河水清澈，自古以来，我国许多兄弟民族的牧民曾经在这里游牧，清代初年还曾在这里实行过屯田。棍噶扎勒参所部蒙民迁居到这里以后，首先在奇兰河岸“斩棘披荆，营修庙宇”，短短几年内，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建成房屋数百楹，供僧俗群众作佛事和居住之需；同时还在河岸选择平整肥沃的地块，伐木芟草，营造农田，“开渠耕地，教令耕种”<sup>③</sup>，依靠自己的劳动，解决自己的食用。经过数年的努力，这部分蒙族人民，发展了生产，建设了家园，生活初步得到了保障。

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断遭到沙俄侵略者的侵扰和破坏。

沙俄侵略者很早就想侵占这块水草肥美、矿藏丰富、气候清爽、宜于农牧的地方。彼得一世在位时，就曾派遣侵略分子潜入这个地区窥探。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

订前夕，沙俄参加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布科夫、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波塔宁以及马图索夫斯基等人，都分别侵入哈喇额尔齐斯河下游，有的还深入中游北境进行探查和测量。

1870年秋，沙俄出兵侵占我国伊犁南境通往南疆的穆扎尔特山口时，斜米巴拉丁斯基的沙俄军事指挥官帕尔塔拉斯基“率兵百余名并炮车等物，无端突至我土尔扈特北部游牧寮鄂博东喇嘛庙中，将扎萨克头等台吉图普新柯什克捆绑行半程，……掠去铜佛象大小二十五尊，并银两、马匹、衣物等件，又将小喇嘛盆克一名俘去。”<sup>③</sup>这次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是沙俄准备武装入侵伊犁一个组成部分，是与侵占穆扎尔特山口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的。侵占穆扎尔特山口是侵略伊犁的前奏，帕尔塔拉斯基的行动则是为侵占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开路。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后，继续向东进行侵略扩张。南路一支由库兹涅佐夫率领侵略匪徒四百八十七人，随带运送武器弹药的辐重车三百多辆，经伊犁、库尔喀喇乌苏向东侵犯。行至奎屯，被我国当地民团徐学功部发现。徐学功诱使敌人分班前进，然后从后路节节歼灭，终于以少胜多，歼灭这股入侵之敌<sup>④</sup>。与此同时，由索思诺夫斯基率领的二百多名侵略军，配带各种武器，从斋桑地区侵入中国，在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布伦托海等地结营驻扎，进行窥探，沿途“绘画地图，钉立标干”<sup>⑤</sup>，为下一步扩大军事侵略引路。这批侵略分子还非法闯入蒙古喇嘛寺庙，进行破坏和掠夺，抢走寺庙供奉的佛象大小七十二尊<sup>⑥</sup>，经清朝政府官员前往禁阻，才“率众西归”<sup>⑦</sup>。此后几年，沙俄侵略分子有的装扮商人，有的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频繁地活动在阿尔泰山和哈喇额尔齐斯河地区。

1876年，沙俄侵略分子波塔宁又奉命组织所谓“考察队”，到我国西部蒙古地区进行窥探。这是波塔宁第二次侵略中国的行动。这年7月，波塔宁在斋桑以东的萨乌尔岭山脚下齐集了他的同伙。参与这次侵略活动的有他的妻子，还有纳法衣洛夫、别勒佐夫、科洛米错夫等人。8月1日，波塔宁及其同伙沿哈喇额尔齐斯河潜入中国，在这个地区活动了十多天之久。当他们在奇兰河畔发现承化寺这个居民点之后，就准备对寺庙采取侵略行动。

当时承化寺刚刚草建，全寺仅是数百间房子的一个四合院，上面是大殿，两侧是厢房，大殿对面是门房，院子中间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经楼，庙门外面是一条小河，出入寺院由小桥通过。寺院内大殿是僧俗蒙民祈祷之所，厢房是众喇嘛的生活区，棍噶扎勒参

所部的僧俗人民就生活在这个安静的地方。

8月30日（光绪二年七月十二日）傍晚，波塔宁等一行来到寺院，借口说要在寺院雇佣向导。寺院喇嘛告诉他们说：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晚上不接待客人，有事明日再来，并答应将他们的要求禀告呼图克图。次日中午，波塔宁等一伙又来到庙门。这时，棍噶扎勒参已经领着众喇嘛下地劳动去了，寺院内寂静无人。波塔宁等一见无人接待，便不顾佛寺的教规戒律，悍然骑马闯入寺院，先在塔楼四周张望，把塔楼上窗户误认为是碉堡上的炮眼，攀登窥探<sup>⑧</sup>。当时有一名小喇嘛从房内出来劝阻，这伙暴徒不但置之不理，反而骑马冲向大殿，登上月台，要进大殿。

沙俄侵略分子波塔宁等人的这种野蛮粗暴、严重触犯教规的行为，立即激起众喇嘛的极大愤怒，他们直追而来上前制止。但这伙侵略者非但不听从劝阻，承认错误，退出寺院，反而出于扩张主义者的习惯和本性，“遂取身边小銃（短枪）向小喇嘛开放”<sup>⑨</sup>，妄图行凶。这时大殿内正在念经的喇嘛赶来，群情激愤，一拥而上，用土块、瓜皮等物向波塔宁、波兹德涅耶夫、纳法依洛夫、米哈宁科夫等人投掷，首先把最嚣张的侵略分子波兹德涅耶夫包围起来，从马上拉下，缴获其武装；然后追上波塔宁、纳法依洛夫等，解除其武装，共计洋枪三枝，腰刀一把，马鞭四个。最后把这伙侵略者关押在一间禅房，监禁起来，张牙舞爪的侵略者受到应有的惩处。棍噶扎勒参午后回来，得知发生事件的经过后，立即将侵略者释放出一人，令回营地去取证件，并命喇嘛们立即宰杀绵羊一只，供给波塔宁等一顿“丰富的饭食”<sup>⑩</sup>。

9月1日，清朝政府布伦托海的官员根据棍噶扎勒参的报告进行审理。棍噶扎勒参指责波塔宁等“携带武器，闯入和平的寺院，骑马在寺内乱冲，违犯佛寺的戒规，还图谋制造武装冲突”<sup>⑪</sup>，这种粗暴野蛮的侵略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而且波塔宁等并无在阿尔泰游历执照，何以在承化寺行凶？对棍噶扎勒参的质问，波塔宁等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只是“哀乞认错，求将帽子掷还”。经“再三恳求”，清朝官员“遂将枪械留下，帽子发还，不许逗留”<sup>⑫</sup>，驱逐出承化寺境。

波塔宁被释放之后，立即编造谎言，向沙俄斜米巴拉丁斯克衙门诬告，斜米巴拉丁斯克当局一而行文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要求查办，一面派军官乌（弗）拉索夫带兵入侵承化寺。

乌拉索夫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一个忠实爪牙。此人出身于沙俄西西伯利亚哥

萨克军，沙俄在伊犁设立领事馆时，就被派来充当卫队，在沙俄领事扎哈罗夫的豢养下，学会了一套侵略本领，通晓中国语言风俗习惯，善于投机钻营，积极为沙俄的侵略政策卖命，很得扎哈罗夫等人的赏识。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谈判过程中，扎哈罗夫将其推荐给巴布科夫，狼狈为奸，跟着干了不少坏事。后因侵华有功，被提升为军官，调到斜米巴拉丁斯克。1867——1868年沙皇政府命令西西伯利亚总督赫鲁晓夫非法扣留当时在斜米巴拉丁斯克办理交涉事务的中国署理伊犁将军荣金，巴布科夫就把这个使命交给乌拉索夫执行。他用阴险狡诈的手段把荣全软禁了半年之久。

乌拉索夫接到前往承化寺寻衅的指令后，迫不及待，中途在济木乃甩掉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派遣同往的翻译官布该，带领“俄、哈萨克百十余骑”<sup>⑬</sup>，直向承化寺扑来。棍噶扎勒参闻讯，立即派人前往阻止，说：“只准身带数人来寺，余皆令在六、七十里外地方驻候。”<sup>⑭</sup>乌拉索夫到达承化寺以后，主人以礼相待，妥善安排食宿，约定当晚会见。

晚九时，乌拉索夫被邀请至棍噶扎勒参的禅房。当时，乌拉索夫等佩带武器，盛气凌人，“大有傲慢之色”<sup>⑮</sup>，递交信函后，立即要求棍噶扎勒参用书信答复，或口头详细答复，并扬言如不回答，他们“即要用认真之法”对待。棍噶扎勒参大怒，厉声斥责道：“汝何敢带领有器械之兵来〔吾〕庙宇，以致亵渎吾之所尊，或是汝前来交战耶？”<sup>⑯</sup>说“吾如不给回信，汝等即要用认真之法，试问将用何法，莫非欲与佛爷争耶？”<sup>⑰</sup>接着，当面“请以历年俄人游历官在蒙古地方骄横之事：同治九年秋间，无端掠去土尔扈特庙中铜佛像大小二十五尊，十一年复掠去佛象七十二尊，该国何不究办？”<sup>⑱</sup>“汝等带兵来讨回信，吾今永远不能给。”<sup>⑲</sup>说罢，将沙俄来函“在手中揉搓，复加唾沫，手撕足践”<sup>⑳</sup>，并严正声明：“此案由京（指北京清朝政府——引者）如何定断，即以如何为是；如欲与我打仗，即请俄国人来罢，吾将动所有阿尔泰人民对敌到〔底〕！”。棍噶扎勒参在侵略者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在侵略者面前公开声明他“不怕俄国”<sup>㉑</sup>。

承化寺人民对沙俄侵略者进行的有理、有力的斗争，挫败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此，承化寺在西北边疆各族人民中的威望不断提高，附近游牧的蒙古族哈萨克族牧民纷纷向承化寺周围迁移，汉、回、满等各族流散人口，有的也向承化寺移居，开荒种地，营作手工业劳动，把承化寺视为他们抗击沙俄侵略者、保

卫自己安全的保障，承化寺在抗俄斗争中不断壮大。

## 沙俄进行反扑

乌拉索夫等在棍噶扎勒参的质问和指责下，“惭不能答”<sup>②1</sup>，十分狼狈，又策划新的阴谋。他退出禅房后，打发他的爪牙先走，向沙俄报告，而自己赖在寺院不走，反而诬告说是被拘留。乌拉索夫回国以后，西西伯利亚总督衙门立即行文沙俄驻华公使。公使布策和翻译柏百福于十一月间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和“乌拉索夫日记”，向中国提出交涉，并向清朝官员进行威胁说：“此事本国看得极重。中国如不认真办理，本国当自行设法处治”<sup>②2</sup>。

腐败的清朝政府在沙俄的压力下虽然知道沙俄的照会和乌拉索夫的日记“显有不实不尽”，没有正确反映事件的真相。但从它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出发，借口是为了“慎重邦交之道”<sup>②3</sup>，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竟下令将与事件有关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廉调离职务，责成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伊犁将军金顺等派员查办。1878年6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奏呈清朝政府，提出“历年以来，俄人游行蒙古地方，骄横生衅已非一端”，每至佛寺，“辄将佛象、供器，手取玩弄以为常”。至于这次乌拉索夫事件的起因，实为“该俄使视（棍噶扎勒参）为寻常蒙古，……遂出大言任意恐吓，以致激切，言语失当”<sup>②4</sup>。左宗棠也根据派往调查的官员依楞额、法克津布的报告呈报清廷，证实“无欺侮情节”，并非“有意欺侮俄人”<sup>②5</sup>。但是清朝政府屈于沙俄的压力，仍将有关官员分别处分，有的革职，有的罚俸；对棍噶扎勒参认为起事之由，责任在沙俄一方，“情理可原”；“然性情粗鲁，不能约束所管喇嘛”，给予“罚俸一年”的处分。<sup>②6</sup>

沙俄对于清朝政府这样的处理还大为不满，驻华公使布策又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威胁，说“如此办理，未免有伤两国和好；若不将察罕格根（即棍噶扎勒参）重办，边界连年各案均难办结”<sup>②7</sup>。清朝政府当时正同沙俄进行收还伊犁的交涉，为了不使沙俄节外生枝，进行刁难，不得不另拟处分办法。布策对新的处分办法仍不满足，继续威胁清朝政府，扬言：“察罕格根若不离其地；该国即派员带兵前往自行处治。”<sup>②8</sup>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了数语，道破了沙俄侵占哈喇额尔齐斯河流中国领土的罪恶用心。

## 围绕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领土问题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沙俄妄图侵占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中国领土的罪恶阴谋，清朝边防官员早就有所察觉。在1866年安置棍噶扎勒参到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时，锡纶和李云麟就曾指出：“俄人之所以必覬觐阿尔泰山者，以此（哈喇额尔齐斯）河源在我国中，……终非彼国之利”，李云麟当时坚持将棍噶扎勒参安置在那里，正是针对沙俄的侵略阴谋，要把这个地方建成保卫祖国西北边疆的要塞。锡纶在后来的奏折中，证实了他们的予想，充分肯定了棍噶扎勒参所部蒙民在保卫西北边疆中的功绩。奏折中指出：“该喇嘛勇敢沉毅，洵有过人处，允为边才中不可易得之品。坐镇空山，今将十年，俄人不敢轻〔窥〕”<sup>②③</sup>。还有人指出：“棍噶扎勒参智略得众，胆勇冠时，素为……蒙古所信服。历年绥集部众，捍卫边圉”，“屡奏奇功，俄人惮之”<sup>②④</sup>。沙俄一再威胁清朝政府要对棍噶扎勒参进行“重办”、“离去其地”，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因为他率领当地人民“据守阿尔泰山”<sup>②⑤</sup>，成为沙俄侵略者蚕食这片领土的巨大障碍。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崇厚在彼得堡同沙皇政府进行收复伊犁的谈判，沙俄“以归还伊犁为诱饵”<sup>②⑥</sup>，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其中就包括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这片领土。在强加给中国谈判代表崇厚的《里瓦几亚条约》中，公然更改《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有关这段边界的规定和勘界议定书，提出“自奎崙（屯）山，顺喀巴（哈巴）、布尔崇（布尔津）二河中间山岭分界之处，过黑额尔齐斯河（哈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内堪迭尔雷克河源”，作为中、俄交界<sup>②⑦</sup>。这条边界线就是妄图割占哈喇额尔齐斯河中游中国领土罪恶阴谋的大暴露，这样就要把我国哈萨克、蒙古，包括棍噶扎勒参所部游牧的大片土地割去。沙俄在北京和在圣彼得堡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认为不剪除棍噶扎勒参和他主持的承化寺，侵占这块领土的目的就难以达到。

由于《里瓦几亚条约》的侵略野心太猖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锡纶针对沙俄在这段边界划界的方案批驳道：“果如所指，则阿尔泰山之地利尽失，塔城隔绝在西，亦成孤注”<sup>②⑧</sup>，这将对西北边防造成严重危害；进而针对沙俄侵略阿尔泰地区的阴谋，提出积极的防御措施，认为“山南克林（奇兰）、布尔津、哈巴诸河之水，西南流入额尔齐斯河，有废墟二，沟塍尚在，土人言是康熙年间屯田遗迹”<sup>②⑨</sup>，主张在该地推行屯田，发展生产，加强防御力量，抵抗沙俄的侵略和蚕食。

1881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了《中俄伊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规定，斋桑湖迤东之界，“应自奎崙山过黑伊尔特什河（哈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sup>③⑥</sup>。1881年12月《中俄伊犁条约》未经正式批准换文，双方还未议及勘界问题时，沙俄两起派步骑七、八百人侵入哈巴河地方，抢先侵占，企图达到先武装强占，然后在勘界时违约多割领土的目的。当时棍噶扎勒参已被调离承化寺，派往西藏学经。棍噶扎勒参属下之泥尔巴喇嘛丕拉斋仍打着棍噶扎勒参的旗号，会同哈萨克族克烈部头目卓尔托拜带领额鲁特等部官员前往质问<sup>③⑦</sup>。清朝边防官员清安等命令蒙哈牧民“各安生业，毋得与俄人争论，致起衅端”<sup>③⑧</sup>，但广大群众怒不可遏，“到处人情汹汹”，“竟有至死不肯分让之语”，并提出“若将哈巴河再行允许分让，不惟哈民无处容身，即蒙民必无活命之日。〔倘令〕众民随地划规俄辖，虽死不从。”牧场上“男女老幼，终日号泣，哀痛之声，达乎遍野”<sup>③⑨</sup>。清朝官员也提出：“倘以哈巴河而轻许之，将来逐渐开端，俄人贪得无厌，恐犹不止此，将来西北半壁几无宁日矣！”<sup>④①</sup>

由于边疆各族人民坚持抗俄斗争，清朝地方官员也进行了积极交涉，在1883年7—8月双方勘分这段边界时，挫败了沙俄妄图违反《中俄伊犁条约》规定，强割哈巴河和毕里则克河的阴谋，最后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划了界。就是这样，沙俄仍割占了斋桑湖以东的大片领土。棍噶扎勒参虽然当时不在承化寺，但他的抗俄精神仍在广大人民中发挥着作用。

通过这次划界，中国又丧失了阿拉克别克河以西的领土，这样，边界线又往东移，承化寺地区在屏藩西北边疆的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 承化寺的扩建，阿勒泰城的建成

1886年，根据《中俄伊犁条约》划分中俄西段边界的工作全部结束后，我国边疆官员就纷纷提出加强边防的种种措施。伊犁将军长庚在其《边备所关时局当务之急》的陈奏中就提出在阿尔泰地区增兵驻防，加强防守的问题，认为这样“则东于科布多之边防可固，西于塔尔巴哈台之东路可以无虞，南可以遮蔽乌鲁木齐全境”<sup>④②</sup>，与新疆全局之安危大有关系。次年，伊犁将军锡纶又奏呈清朝政府加强阿尔泰地区的防务。奏文中充分肯定了棍噶扎勒参所部人民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的功绩，指出“棍噶扎勒参